

美国普利策大奖传记作品

HIROHITO



真相

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Herbert P. Bix

王丽萍 孙盛萍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K833.137.535
1

美国普利策大奖传记作品

HIROHITO



真相

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Herbert P. Bix

王丽萍 孙盛萍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 (美) 比克斯著；王丽萍，孙盛萍译．北京：一新华出版社，2004.8

ISBN 7-5011-6759-1

I. 真… II. ①比…②王…③孙… III. 裕仁 (1901~1989) — 传记
IV. K833.1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790 号

图字：01-2001-1206 号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Copyright © 2000 by Herbert P. Bix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Xinhua Publishing Corporation (Xinhua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USA)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真 相

——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

[美] 赫伯特·比克斯 著

王丽萍 孙盛萍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www.xinhuaupub.com>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北京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

787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4.5印张 插页2张 530千字

2004年9月第一版 2004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759-1/K·428 定价：68.00元

译者说明

一、本书为美国哈伯·科林斯公司 2000 年出版的《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的中译本。

二、本书中（ ）内为原作者注释。译者的补充注释标注“译者注”。

三、为了忠实传达史料，对原著中引用的日文，采取了直接从日文原始资料翻译的方法。

四、出于忠实原著和史料原貌的考虑，对于原著和所引日文资料中与中国有关的人名、地名、官职、图表等，一部分采用了旧称。特别是日文资料中的“支那”“满洲国”等有背中国历史，有损中国人民感情的歧视性表现，出于同样考虑，亦维持了原状。

五、对原著中固有名词、时间、人数、地点等事实性错误，征得作者同意，直接予以修订，未加译者勘误说明。

六、征得日文版译者的同意，在翻译日文资料和对原著的事实订正方面参考了日文版。

致中国读者

《真相——裕仁天皇与日本侵华战争》一书聚焦于日本一位不同寻常的政治领袖的性格、行为和思考方式，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 20 世纪的日本社会和政治。全书关注的中心在于昭和天皇是如何在近臣的帮助下为自己开创了一方政治空间，并从此（在这片空间里）逐渐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决策过程中行使了领导者的权力。他不仅在统治的前 20 年里，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最为重要的公众角色，而且，作为一个在幕后操纵局势的首脑，当形势危急的时候，他往往倾向于服从军部所主张的政策导向。这与明治天皇的亲英美路线完全背道而驰，而这位祖先对裕仁的个性有着极大的影响。

这部批判性传记的三角结构还凸现了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这里，我们需要从三种交叉的路径来了解这位天皇。他是一个很有特性的存在——身处一个复杂精细、等级鲜明、协调一致的决策系统的中心，掌控着真正的权力。他代表了一个有着自己的目的论和独特的正统化模式的官僚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在战时条件下发生了转化。同时，他又体现、表达并鼓励了一整套美化 20 世纪 30—40 年代初侵略战争的思想言论，他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遏制了日本民众民主主义思潮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在裕仁的父亲——1912 年登基、患有慢性病的大正天皇统治下延续问题的担忧，影响了对裕仁的培养和教育。书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对裕仁的教育以及他如何演变成一位精悍活跃的天皇的过程。这一部分的探讨为下一步的考证奠定了基础。第三部分记述了在秘密状态和无责任体系背景下，寡头政治有关战争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书中至关重要的、关于战争的章节揭露了天皇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缺乏清晰的道德原则的史实，这些道德原则本来是有可能将他与日本社会中支持侵略的力量区别开来的。对于中国读者

来说，这些章节中提及的许多问题都有着意义深远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日本对皇权及其占有者虔诚的崇拜；东京方面以“自卫”名义发动的日本对满洲单方面的接管；日一中战争中，日本违反战时国际法的行为；还有依然充满争论的南京大屠杀——关于这一事件，至今找不到能证明天皇曾就此开展过任何调查活动的公开线索。第三部分还论及了日本向南推进过程中日本海军的政策，在1939年初日本帝国海军占领了中国南海的海南岛之后，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了珍珠港战争的爆发，并将日本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带入最后阶段。

总而言之，本书激发读者去正视战争是如何被正当化的，日本国家首脑及其近臣们的历史是如何被篡改的问题。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我希望将裕仁作为一名特别的战争领导人而对其进行重新评价。书中还论述了亚太战争的起源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由日本和美国官方共同编造的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终结的神话。1945年日本战败以及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裕仁的继续在位，为他日后持续以不同方式对日本的民主政治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而其影响后来被证明是有害的。

在本书的第四部分，我再次将笔锋探入裕仁的思想，描述了亚太战争和美国占领之后昭和天皇与日本民众之间关系发生的变化。我对裕仁行使最高统帅权所应附带的责任提出了质疑，阐明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他是怎样逃脱了作为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所应承担的全部法律、政治和道德责任的。

本书的意义在于超越了过去的研究，值得引起当今社会的关注，尤其是持有如下观点的人们的关注——认为国际秩序不应建立在寻求霸权之上，应该承认所有国家在形式上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无视国际共同体的存在而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的“人道主义”战争和军事干预，使许多国家中存在的国家无责任制度和实践成为新的突出问题，这其中也包括了那些对外夸耀本国民主文化的国家。这种战争有可能使政治家们将其国家和民族主义引向极端，并使他们免于承担后果。在此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或将其“正常化”。日本曾经有过的典型的无责任体系既是我们借鉴过去历史考察当今问题的理由，同时也在提示我们，不触及昭和天皇，日本的过去就得不到充分的研究。

我希望本书的中文版能对读者更好地了解中日关系史中那段不幸的时

致中国读者

期有所助益。

日本一桥大学的博士生、活跃的新闻记者王丽萍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孙盛萍承担了本书艰巨的翻译工作。感谢她们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感谢新华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发行。

赫伯特·P·比克斯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夫人敏枝，我将此书献给她。正是她不辞辛苦地工作，才使我得以处理大量的资料，文章中一些见解的表达也得益于此。

我要特别感谢居于清静的弗吉尼亚州米尔保罗谢南多亚溪谷的山姆·希尔曼，他是一位艺术家，曾经还是编辑，他对全书的原稿进行了详尽的评论。他不但完善了每一章节的流畅性，而且成为我思想观点的丰富源泉，他是一位敏锐的评论家，也是我的挚友。我非常感激他为本书的充盈所做的贡献。哈伯·科林斯出版公司的蒂姆·达根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他的批评深刻透彻，他本人在各方面都对本书表现出了耐心和支持，对他，我由衷地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哈伯·科林斯出版公司的苏珊·卢埃林，她对全文所进行的审稿工作是非常出色的。自始至终，我的组稿人苏珊·雷宾尼都给予了本书全面的支持。

约翰·道尔为本书提出了明智的建议，他还对关于战争的两个章节的早期文本作出了宝贵的评论。十多年前，我访问英国的设菲尔德，老友中村正则送给我一本他的关于战后日本君主制的书。大约同一时期，居于设菲尔德的格伦·胡克送给我一本《昭和天皇〈独白录〉》。这两本书促使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在我调查研究和写作的初期阶段，大卫·斯温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反馈意见。马丁·舍温对原稿的早期文本进行了深刻敏锐的评论，而多年来一直给予我毫无保留帮助的马克·塞尔登则对最后一章做出了评论。对上述各位以及对本书做出评价的费罗兹·阿迈、布莱恩·维多利亚、埃德·弗里得曼和乔恩·哈利迪，本人深表感谢。诺姆·乔姆斯基为改进书中战争临近部分提出了见解深刻的建议。在安德鲁·戈登的帮助下，我得以重新回到哈佛大学执教一年。

我还要感谢哈佛—燕京研究所图书馆和一桥大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调查研究的园地。感谢埃利·克莱阅读了第七章初期的草稿；感谢乔纳

森·德雷斯纳对本人多次向哈佛图书馆请求资料所做出的回复。还有菊池伸辉，他娴熟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参加我的关于昭和君主制的讲义对我助益良多。

美日教育委员会研究基金（富布莱特计划）的资助使我得以于1992年在东京的一桥大学开始本书的写作计划。在那里，我遇到了吉田裕和渡边治，他们两人就现代君主制的变化问题撰写过大量杰出的著作。他们论述了自己对裕仁天皇的见解，并向我讲述了他们对现代日本的军事、政治和宪法历史的深邃认识。多年来，他们解答了我的各种问题，对我的帮助一直都是富有理解力和慷慨无私的。在另一位对我至关重要的老友栗屋完太郎的帮助下，我得以接触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而他也是我思想的源泉，他给我提了大量的建议。如果没有他们，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本书的分量会减轻很多，我也会忽略许多重要的日本原始资料。90年代末，我成为一桥大学社会学研究生院的一名教师，在这个非常理想的环境中完成了调研工作和对原稿的最终改写。

我还要对冈部牧夫和山田朗致以深深的谢意，他们与我分享了研究资料并和我一道探讨问题。此外许多杰出历史学家的大量著作帮助我理解了裕仁的生活，但我还是要特别提及田中伸尚和藤原彰以及田中宏巳，后者帮助我获得了还未出版的奈良武次将军的自传资料。感谢赤川博明对我的支持及所提供的资料。

在我从事写作的10年里，我的岳父渡边重明向我讲述了昭和早期的往事。吉田了子夫人也配合我的工作，不间断地为我提供了日语资料。

第十三章的某些部分源自我的论文“日本延误的投降——再解释的尝试”此文发表于《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 (1995年)；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的一些段落取自于论文“日本象征天皇制的创造”，此文发表于《日本研究期刊》(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995年)。感谢两期刊允许我使用其中的资料。

序 章

1946年冬末，来自日本国内外的压力不断增强，45岁的裕仁天皇将面临着作为战犯被起诉的局面。1941年，他任命东条英机为总理大臣随后又对美国和英国宣战，如果裕仁天皇被起诉，他将因此而受到审判。接下来等待他的将是法庭宣誓后的提问，比如他何时得知珍珠港偷袭计划的，他在御前会议上所起的作用，战俘待遇等。一旦无法证明裕仁天皇是清白的，他将遭受某种形式的惩罚，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耻辱。皇室成员中有人劝他退位，以逃避政治责任，维护天皇制；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公开要求他退位，以期给国民树立一个道德典范。

与此同时，新宪法草案刚刚完成，这部由占领了他的国家的美国占领者们设计的新宪法草案，既保留了君主政体又剥夺了君主的一切政治权力。国会准备开始就新宪法及裕仁被削弱的地位问题展开讨论。^①为了达到占领目的，他的美国保护者们希望继续利用他，但他们也意识到压在裕仁头上的证据的分量，因此，他们需要了解裕仁本人对战败的看法，因为战争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他们特别希望他能解释一下，既然他有足够的力量让他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投降，为什么没有同样有力地战争开始的时候阻止它，以使百万生灵免遭涂炭。

要避免所有这些对他的皇位以及个人的威胁，裕仁得准备一份说辞，对他作为日本国最高元首在这20年的行为作出解释。这份说辞要能帮他抵挡那些指控——也许他永远也不会去面对、但又未必能躲得过的指控。由于他的自我辩白将把战争和战败的责任归因于他最忠诚的某些大臣身上，所以他必须秘密地准备。这些事情在当时一旦曝光，维系裕仁与日本国民的本已很脆弱的精神纽带将会断裂。随之，他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而言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用处。^②

1946年3月8日上午10点30分，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皇宫中

钢筋混凝土掩体里的裕仁办公室。裕仁自太平洋战争伊始，就住在那里。这天，他虽然感冒了，可还是召集了最信任的5个近臣。近臣们将要听他回忆他在位期间曾发生的大事。走进他的办公室，近臣们看到裕仁靠在一张西式的单人床上，这张床是临时搬进他书房的。床脚，已为近臣们准备了几个座位。天皇身着亮白缎睡衣，他的枕头和缝制的毯子是纯白纺绸的。在神道宗教里，天皇是最高宗师，这种衣着象征着宗教仪式的纯洁，而并非忏悔。近臣们落座后，开始提问一些事先拟好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秘书暗示给他们的。他们听裕仁口述他的回答，宫内省内记部长稻田周一做了笔录。后来稻田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在那种时刻要仓促地听取天皇的解释？那段时间，在战犯审判问题上，有人提出陛下的责任，因此，有必要把天皇真实的想法马上记录下来。”^③

很快，一份概要由天皇的一个近臣交给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军事秘书，概要是根据天皇那天早上口述以及之后3周内进行的另外4次口述的内容整理的。然而这份概要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这或许是因为占领军司令部（GHQ）的美国当局者早已成为天皇最大的维护者和神话编造者的缘故。在《独白录》的日文原稿中，天皇试图传递这样一种信息，即1928年以后，除了两次特别事件——1936年的军队反叛和1945年的战败投降，他一直远离政治，避免直接干涉决策的制定。他还暗示，与美国和英国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尽管他个人一直反对，但他无法用他个人的影响阻止战争。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国内动乱，但主要是由于宪法的约束。“作为一个立宪政治下的立宪君主，在战争行为发生时，我不能不同意东条内阁的决定。”^④

裕仁的《独白录》完成大约10天后，他与那几个近臣又用英文起草了另一份文件，概括了他为自己辩护的要点。他强调说“实际上我跟囚徒一样无力。”^⑤那份较长的《独白录》直至1989年裕仁死后才公之于众。英文版本直到1997年才发现并在日本公布。它把裕仁描绘成一个无助的“军国主义”的傀儡，而且篇幅上也被大幅压缩。这两份材料正是裕仁隐蔽、神秘和被误传的一生的最好象征。

作为20世纪日本历史上最复杂、最令人费解的政治人物，1926年末，裕仁开始了他的统治，时值日本与中国关系再次出现冲突的前夜。统治持续了62年，经历了战争、战败、美国占领、冷战和日本繁荣。前20

年中，从最广泛和最深层的意义上说，他是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精神生活的中心，事实证明他的权力行使给他本国人民和被侵略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尽管他的大亚洲帝国的时间跨度不长，但影响是巨大的。他所领导的扩张行为将他的国家带入战争，并夺去了大约 2000 万亚洲人民的生命（据政府 1945 年后公布的官方估计），310 万日本人的生命及超过 6 万西方盟军的性命。^⑥

事态没有像裕仁所预想和期望的那样发展。然而，当需要他对那些事件中他所起的作用作出解释，留下真实记录时，他和他的近臣们却很不诚实坦白。他们巧妙地制作一份文件，目的是要引出他一直是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及和平主义者的结论。裕仁没有提及他和他的近臣们是怎样帮助军队成为一支巨大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并推动了军备扩张的。他故意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他和他的近臣们曾多次妨碍对明治政治制度中更民主、更非军事化的政治程序的利用。在有关他作为一个军事领袖和国家元首所起作用的问题上，他有意捏造一些细节，混淆自己行为的动机，以及能证明行为和理论的时间。另外，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新民族主义思潮下，他是如何通过充当积极的意识形态核心的角色，来鼓励民众的好战性的这一问题，他也保持了沉默。

曾负责撰写《独白录》前言部分的一个近臣说，天皇要求他只简略地写出“大东亚战争的背景原因和直接原因、战争的发展和结束的过程。”这也是不真实的。裕仁也没有解释他和他的宫廷近臣们是怎样使用各种手段动摇 1920 年中期和后期发展起来的政党内阁体系，坚持选举了下一任总理大臣并将他们自己的国政方针强加给他。他没有说明在中国的战争是怎样发动的，没有说明在战争扩张中他的直接主导作用，没有说明日本军在陆地和空中的所作所为。对于给他的人生以极大影响的经历和环境、他的价值观、塑造他人格和行为的思想等，裕仁也都一直缄口未提。一心要保住皇位，全然不计这样做将给别人带来的后果，在现代君主中，裕仁是最为阴险奸诈者之一。

本书致力于精确研究那些把裕仁塑造成一个君主，一个人的各种事项，以及深浅两个层面的社会观念。研究的中心将集中于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 年）之前、之中以及长期的战后阶段，那些曾经塑造了裕仁及宫廷近臣们思想和行为的力量要素。本书还将探究，当裕仁处于事件中心时，他对政策制定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因为我关心的不仅在于由裕仁的祖父明治天皇构筑的现代神授君主制，它被用来转变日本人民的思想，使其具有军国主义及臣民价值观，使日本人民走向战争。我的关心还包括改革后的君主制，由于它被巧妙地与战争和官方记忆分离开，以至存续至今。本书追踪了宗教和世俗的天皇制对裕仁的影响，他与国家各机关的相互关系，以及裕仁在位过程中君主制的演变。最后，本书对裕仁漫长的一生进行了探究，因为在日本广泛的政界和政府—军事关系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影响力能与裕仁相比。他的一生可以向我们提示很多在那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日本人政治态度的转变。

这本书并不是一部正统的政治传记。裕仁不是一个社交型、外向的人，所以没有多少朋友愿意坦率地描述他。他是一个谨慎的人，有时会用一言不发代替雄辩。在公众面前，他习惯于保持暧昧的社会生活，在私生活方面也是小心谨慎，训练有素。裕仁没有留下多少能展示他思想的有他签名的文件，这使我们无从捕捉他对人生中各重大事件的反应。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一样，他确实也在一些仪式中写过和歌并成册出版。和歌共有860多首，多数写于1945年以后。^⑧但他没有出版过回忆录，他总是通过别人传达他的想法或意图，而在日本，臣下对天皇的批判性表述是不敬也是不合适的。

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据说他从11岁起就开始认真地记日记。或许他确实记过。可是那份日记，被宫内厅牢牢地把握着，现在不肯，也许永远也不会让研究者们自由地接触到。这个机构正在编写裕仁统治的编年史，但编制的“前提也是不公布于众……因为它涉及到有关人员的个人隐私。”^⑨另外还有几个禁区，如裕仁与其家庭成员的信件，“圣谈拜听录”的各种版本，大量未公开的文件，侍者的日记等，这些资料能把裕仁的整个存在解释清楚。美国政府也没有向公众公开所持有的有关裕仁的秘密记录。例如，裕仁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谈话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标有“裕仁”的文件。^⑩

要探究裕仁的生平，了解他的行事动机，须依赖他随员中的记录官和日记者，他们在他身边工作，因此能很好地了解他。实际上，他们已经发表了他们的记录和日记。此外，还必须依赖那些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们的记述，战争时期，他们曾记录过裕仁的发言。最近，基于日本新一代学者们的努力，几百份文件、日记、回忆录得以公开，关于战时和战后的天皇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发表，这大大改变了今天日本人对天皇制的评价，使我

们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日本都最终有机会去了解那些曾塑造了裕仁一生的智力性、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因素。尽管还有很多资料来源上的空白，可是这些新资料表明，裕仁在那个充满战争的世纪里的故事，需要重新讲述了。

日本学者们的著作还让我们了解到，裕仁是多么远离日本民众。尽管他成了狂热的民族崇拜的中心，走到哪里都被人称为活着的神，然而，从这个词的世俗意义上讲，他从未“民众化”过。由于是在一个官僚政治的君主政体中执政，人们很容易认为裕仁是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机关”，而且还是一个个人意志超越所有法律的存在。^⑤由上所述，新的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彻底了解裕仁是怎样具体体现了日本整个现代政治发展中逻辑的矛盾性，而这一点是其他任何日本人都做不到的。

日本现代政治的发展始于裕仁的祖父睦仁天皇，其死后被称为明治“大帝”。自1868年成为天皇后，明治天皇便成为国家现代变革的指南针。事实上，19世纪末明治确立自己的权力并且使之制度化的过程，直至1945年，一直是影响日本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宫廷与政府分离并按照欧洲君主制的模式重新组建，随后是宪法的制定。作为明治天皇1889年送给国民的“礼物”，这部宪法称天皇是一个具有完整的、神圣血统的继承人，由男性子孙继任。政府在此基础上隶属于君主制。^⑥宪法将天皇定义为“神圣不可侵犯”、“帝国元首”、军队的最高指挥者（大元帅）和国家所有权力的统揽者。他可以召集和解散帝国议会；发布诏书取代法律；任命和罢免国务大臣、文武长官并决定他们的收入。宪法的基本原理是天皇作为法律的根据，超越宪法，宪法的目的不是要限制天皇的权力，恰恰相反，宪法一要保护天皇，二要提供一种机制，以保障天皇的权力行使不会受到任何限制。这种政体的外表虽然是立宪，但绝不是君主立宪制。^⑦

明治天皇遗赠给裕仁的第二份伟大遗产是日本的殖民地帝国，以及作为地域强国的新地位，受其控制的不仅有大陆还有岛屿。日本决定要通过加入亚洲的殖民地化竞争以赶上先进的西方各国，在这一决定做出近10年时，1894年，为了占领并控制朝鲜，日本的寡头政治统治者们对中国发动了战争（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中国战败，第二年割让了台湾、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中国同意支付巨额赔偿金，之后又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马关条约——译者注），允许日本船只在长江航行，

日本商人在内地和协议口岸开设工厂（如天津、上海和广州）。

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提高了明治天皇的威望。作为国家寡头政治统治者的主要维护者，43岁那年，他成为国家的象征，身兼神权君主和躬亲统治者的双重形象，决定国家的一切事物。在这个民众已习惯于不关心军事，对武士阶级怀有猜疑、恐惧和轻蔑心理的时代，1895年的胜利唤起了民众对新征兵制的军队的支持。同时，它还刺激了民众蔑视其他种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在其中注入了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优越感。

日本打败中国后，东亚的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来自德国、俄国和法国的威胁迫使明治天皇和他的寡头政治家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紧接着，列强们加剧了他们对中国的领土和贸易专权的争夺。俄国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并于1898年将势力触角伸到满洲。俄国的目的是对朝鲜施加影响并以此来牵制日本。^⑨同一年，美国发动美国—西班牙战争，吞并了夏威夷，攻占了菲律宾、威克岛、关岛和中途岛。1900年，西方列强发动了一场国际远征去扑灭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日本军队也参加了。第二年，日本伙同西方主要强国与中国签署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进行赔偿，并给各国在指定的中国城市永久驻军的权力，以保护他们在那里的侨民和外交官。

3年后，1904年，日本对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发动了突袭（日俄战争——译者注）。接踵而来的冲突夺去了约8万日本人的生命。战争以妥协的和平方式结束，没有赔款。首都东京发生了反对讲和的暴动，给人留下了终有一天俄国会寻求报复的预感。明治天皇在战争中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然而战争仍为他的形象增添了光彩。日本获得了俄国尚未到期的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贯穿满洲南部1100公里长的铁路和鄂霍次克海中萨哈林（库页岛）的南半部。所有这些都作为明治天皇划时代的伟业受到称颂。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竞争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就在这时，裕仁登上了世界舞台。在他的统治下，日本的政治剧以战争和战败的形式步入了灾难性的结局。裕仁是这样一个人，他总是与他的人民格格不入，对民众的生活也不甚了解，而且从未完全肯定地得到他们的真正支持，他是战争和战后被占领下的幸存者。通过考察裕仁的为人，考察他是如何保住皇位，如何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延续了天皇制的传统，我们可以对日本的政治产生新的判断。

以情感、意识形态以及分担战争记忆为基础，裕仁与日本民众形成了

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观察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密切共栖的关系中，他和他的国民是怎样并肩站在一起的。当然，控制和利用这种关系的永远都是天皇一方。在受到战争和战败打击之前、之中以及随后的时期，他向国民们展示的是一个“传统的”地位崇高，居高临下的自我，只强调自我完美的一面，从不提缺陷。反过来，国民们则要像对待一位活神和理想中完美的父亲一样，毕恭毕敬，诚惶诚恐。理论上讲，裕仁是不能承担责任的，因此，国民们不仅要协助他建立他的统治，还要为他的权力担负责任。至于这种模式和国民生活的组织原则是否有失妥当，从来也没有让国民讨论过。（然而，每个时期，他们当中总会有个别人去讨论。）

1926年裕仁即位，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政治家们对国家内外政策的不满。于是，一些政治和军事精英们开始讨论国家政体——“国体”的意义。他们认为，以皇室为核心的“国体”体现了日本国家以及社会最佳并且可行的原则。当对社会的不满深化时，很多人开始相信利用天皇的权威可以促成改革。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精神主义的、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形式产生并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就是被称为“皇道”的民族主义。“皇道”是一种具有鼓动性的政治神学。它源于这样一种理论，即天皇是日本过去和现在真正的活的化身，并且是所有人应该追随的道德完美的典范。这个词一方面表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表示了行动的战略方针。此外，“皇道”还使日本避免了追随外来的主张学说，如西方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只要能主宰自己，这个民族就会重新获得自尊，就能够向西方的政治信条展开“圣战”。“皇道”思想虽来源于19世纪中期的危机，但是，它在20年代末的复兴，30年代初在日本外交上的实际应用，不但促进了日本与不久前的那段历史进行决裂，也使得这个国家可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

“皇道”成为压倒日本人热衷于西方精神和经济征服的惯用语。不仅是军事方面，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都为日本人提供了思想和感情上的方向。此外，它使日本人对于由于恶意攻击和自以为是而强加给他人的痛苦，感觉迟钝。正如一个时期，美国也曾以冠冕堂皇的“替天行道”，激发美国的民族主义一样。几乎是一夜之间，日本外交政策的审议和实施中曾经有过的国际协调精神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神道般冲动地表示要净化亚洲，以避免英美政治文化的毒害。“皇道”中还嵌结着一个日本佛教各派的千年王国的信仰，特别是日莲派对其鼓吹得最为强烈，它们认为

由于拥有独特的君主制，日本国是教导道德和统一全世界的强大力量。参照“皇道”的神圣信条，“世界八方”都在天皇的统治之下（八统一字），“天皇仁慈深厚的心”（大御心）等成为一种常识，与之相应，对那些拒绝接受天皇那父亲般仁慈的人，要积极运用武力。

国民认为自己是以太皇为中心并且种族优秀，官员们则认为在道德上国家至高无上，在此背景下，裕仁和他的主要顾问们作为一股独立的势力，坚决且直接地参加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来。通过在幕后的积极活动，裕仁影响了最初三任总理大臣的权力实施，促使了政党内阁的崩溃，认可了反对强化国联和平机构的行为。当他的调停遭到拒绝并导致了陆军的公开反抗时，裕仁和他的顾问们便缩回来，默许了军事侵略。

从最初开始，裕仁就是一个行动型的强有力的天皇，但矛盾的是，他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一个防守型的被动的君主。全世界都认为在决策过程中，他没有起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个人作用，坚持将他视为一个无能的、有名无实的元首，缺乏智慧，没有知性。事实是，他比大多数人评价的更精明、更狡猾，也更精力充沛。从裕仁的谨言慎行中，人们可以读出比他实际说的和做的更多的东西。在执政的前22年，他发挥了高度的影响力，对于想做的事，他很少表现出无能。当裕仁没有运用权力影响政策或改变已制定好的行动路线时，他的决定就另有深意。

从1937年末起，裕仁逐渐成为真正的战争领袖，在中国的作战从计划、战略制定到指挥都受到他的影响。他还参与了陆海军最高将官的任命和提升。从1940年末起，当更为有效的决策机制到位后，他对各阶段的政策复审进行了重要的参与。这种参与在1941年12月对美英开战时达到顶点；与此同时，他和他的近臣们还充当了日本统治精英们的情绪和挫败的风向标。为了高居于决策过程的顶层，对应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他故意不去理会由他的祖父、明治天皇制定的先例，改变了对外政策的方向。慢慢地但也是确确实实地，裕仁与领土扩张和战争的狂热情绪融合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裕仁的生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保住皇位，避免作为一名战犯被起诉成为他的当务之急。与处理他的那些陆海军将官的问题同样，在处理与美国的妥协政治上，他也表现得驾轻就熟。美国强加的改革破坏了相对独立的君主政体、内阁制政府以及日本国民的三角关系。被剥夺了最高统治者地位的裕仁被迫成为国民统一的“象征”。然而，即使在美国制造的从属于新宪法的“象征天皇”制中，他扮演的仍是抑制